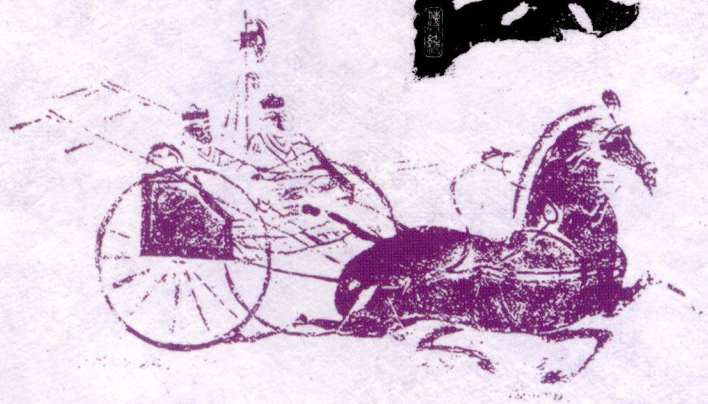


传统经典文献导读丛书

纪宝成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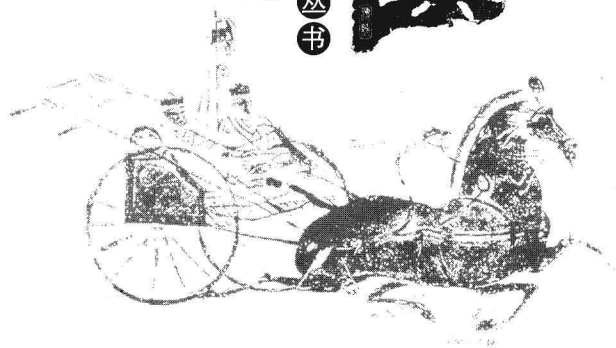
#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经典文选

刘后滨 张耐冬 张雨 等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传统经典文献导读丛书

纪宝成 主编



#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经典文选

刘后滨 张耐冬 张雨 等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典文选/刘后滨, 张耐冬, 张雨等编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7

(传统经典文献导读丛书/纪宝成主编)

ISBN 978-7-300-16009-2

I. ①中… II. ①刘…②张…③张… III. ①政治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2208 号

传统经典文献导读丛书 纪宝成 主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典文选

刘后滨 张耐冬 张雨等 编著

Zhongguo Chuantong Zhengzhi Wenhua Jingdian Wenxu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1 插页 3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5 000	定 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总 序

纪宝成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中华文化绵历数千年而未曾中绝，显示了其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学界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解读未尝没有道理，但据本人浅见，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乃是根植于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品格，在于其随着历史的演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汲取、熔铸新的理论学说，与时俱进，实现自我更新。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正是对中华文化这一品格的准确描述。汉代的经学，正如蒙文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是以儒家为主，对百家学说的一次去粗取精的整合。同样，唐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莫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形成新的理论学说。因与革、常与变、超越性与时代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面。

当前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发掘与扬弃。我们在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更需要深入挖掘其超越性——那些在悠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和在旧时代旧体制下未能成长发达的灵根善苗。道理十分简单，无论是伦理道德、政治、教育还是经济领域，古人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宝贵遗产。

在伦理道德领域，古圣先贤致力于铸造与追求理想人格。“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内圣”又是“外王”的基础。自孔子以来，历代优秀的儒者莫不把理想人格作为修身的首要追求。因而，

理想人格也在他们的共同追求下不断完善。孔子提倡“刚”的品格，反对见利忘义；提倡“勇”的品格，主张杀身成仁。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至孟子光大之，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实质上是进一步弘扬了孔子对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的态度。孟子又提出“养吾浩然之气”说，这是对孔子提倡的理想人格的补充。这种大丈夫的品格和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作为人格修养的几乎尽善尽美的境界，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会过时，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这种精神和品格，在后来更多地表现为仁人志士在与恶势力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刚正不阿。如东汉张纲辞刺史不就，不顾个人安危弹劾跋扈将军梁冀；北宋包拯执法不阿权贵，被民间尊为“包青天”；林觉民牺牲自身，“为天下人谋永福”。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正是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说，这些仁人志士以他们的躬行践履、高风亮节，又将这种完美的人格发扬光大，并丰富了其内涵。

在政治领域，中华文化所提倡的和谐理念至为可贵。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已经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和”视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至晏子，又以烹饪为喻，对“和”的政治理念作了进一步阐发。孔子及其弟子们也认为“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综合古人的思想观点来看，“和”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相济相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与“和”看起来相似实则相反的是“同”，就是容不得异己的力量、思想、意见，大搞高度统一。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和”的时代，都是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时代；而以国家行政力量强行求“同”的时代，则大多万马齐喑，“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和”的时代少而“同”的时代多，这无疑是中国历史难以形成质的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的政治理念，虽经古人提出，但在旧时代并未能茁壮成长，是一株处于发育停滞状态的灵根善苗。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使“和”的理念在新的时代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并在社会政治建设中产生巨大影响。这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自我更新的典型代表。

在教育领域，中华文化有讲究师道尊严的优秀传统。师道尊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保证。“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真正的师道尊严，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师严”，即社会对于师的尊重，即使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君主也不得臣，反映在社会层面，即是整个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二是“道尊”，也即对学术的真心信仰，学术不做政治、权力的奴婢。反映在政治层面，即是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及其对君权的制约。一面空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面以教育为政治的附庸，以权力奴役学术，而欲教育培养杰出人才，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王朝堕落到行政严密控制教育之时，堕落到“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谗谄之忠，习谄谄之辞”之时，也正是它的人才枯竭之时，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这个王朝的轰然倒塌。在大学日益行政化为衙门，教授沦为权力的包身工，中小学教师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的今天，而我们的教改又歧路彷徨之时，重温古人有关师道尊严的理念，也许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在经济领域，古人很早就提出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认识到“恒产”是民“有恒心”的前提，因而提出“治民之产”的经济思想。经济建设如果不能为老百姓提供恒产，解决老百姓的生活保障，那么就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这样的经济建设也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注定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孟子把“治民之产”提到“王道之始”的高度。如何实现这一理想蓝图？《大学》中所引孟献子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段话所传达的理念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就是说，国家不能与民争利，应斩断权力垄断利益的黑手。做不到这一点，放任既得利益集团以权力自肥，所谓“治民之产”

终将成为空中楼阁，而民无恒心的社会，也必将是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发展又如何能够持续？古人这些闪光的理念，对我们走向改革深水区的当今社会，也不啻是一服清醒剂。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值得弘扬与发掘的，绝不止于以上这些。这里不过是以点带面，略加剖析。认真整理与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让这些优秀的思想与理念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生命力，无疑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教育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古老的中华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开始了正面交锋，并很快在“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一败涂地。从此，从“天朝上国”美梦中醒来的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从未怀疑过的古老中华文化。与此同时，一种思想也在潜滋暗长：对中华文化进行全盘的否定，并将中国落后于西方一股脑地归咎于中华文化——这种思想现在也有一定的市场。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思想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中华文化的时代性，有意无意地忽略其连续性与超越性；片面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关联，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把专制政治所结的恶果生硬地嫁接给文化。在他们看来，人类文明进入到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为核心理念的近现代时期，已与君主制下重等级、德治的中华文化格格不入，否认曾经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当然，随着近几年来国学热潮的风起云涌，也不乏个别人士对中华文化抱有盲目乐观的心态，甚至把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一些理念当做拯救工业文明弊端的灵丹妙药——这种思想我在这里不准备再作批评，甚至也不觉有值得批评的价值。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前提。那种对中华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坐井观天式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要不得的。随着中华民族渐渐地崛起，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必将复兴，以独特的方式和理念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里，我大胆断言，这种复兴，既不会像某些坐井观天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回归，更不会像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是对中华文化的彻底革命，是根植于西方现代理念的重建，而必将

是一次凤凰涅槃，是中华文化在现代化大环境中的一次自我更新、与时俱进。这次更新，是对自身的扬弃，是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吸纳与熔铸，是在专制集权政体下未能成长的灵根善苗的一次新生，让善的因素在新时代茁壮成长，成为中华文化自我更新的一部分。

这套丛书以弘扬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为理念，从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经济四个领域，精心挑选了一批经典文章，前有解题，后加注释。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过程。限于编者水平，加之是一次尝试性的工作，缺憾与不足在所难免，其“择焉未精、语焉未详”之处，尚祈社会各界不吝指正。



# 目 录

导论	1
----	---

## 君道与政体

刘向《说苑·君道》	31
荀悦《申鉴·政体》	47
吴兢《贞观政要·君道》(节选)	55
吴兢《贞观政要·政体》(节选)	61
吴兢《谏十铨试人表》	69
李华《中书政事堂记》	71
柳宗元《封建论》	73
黄宗羲《原君》	78

## 国策与方略

贾谊《治安策》	83
董仲舒《天人三策》	96
诸葛亮《隆中对》	110
王朴《平边策》	112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114
张居正《陈六事疏》	130

## 选官与用人

汉高祖论三杰·····	141
曹操《唯才是举三令》·····	143
刘毅《论九品官人法》·····	146
吴兢《贞观政要·择官》·····	151
张九龄《上封事疏》·····	156
陆贽《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	161
司马光《论监司守资格任举主札子》·····	168
苏轼《私试策问·人与法并用》·····	170
吕大临《上哲宗论选举六事》·····	172
彭龟年《审材辨官疏》·····	179
王夫之《论停年格》·····	181

## 政论与史鉴

贾谊《过秦论》·····	187
崔寔《政论》(节选)·····	193
诸葛亮《前出师表》·····	197
李世民《〈晋书〉帝纪论》·····	200
魏徵《谏太宗十渐不克终疏》·····	204
欧阳修《朋党论》·····	209
苏洵《管仲论》·····	211
苏轼《贾谊论》·····	214
苏轼《晁错论》·····	217
苏辙《六国论》·····	220
司马光《〈资治通鉴〉史评》(节选)·····	223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233

朱熹《论去邪疏》·····	236
牟滂《进故事论为君难四事疏》·····	238
海瑞《请臣下尽言疏》·····	241
王夫之《读通鉴论·唐玄宗》·····	248
王夫之《宋论》(节选)·····	251
赵翼《武后纳谏知人》·····	255
赵翼《明乡官虐民之害》·····	259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	262

## 士风与世风

仲长统《昌言》(节选)·····	269
理乱篇·····	269
损益篇·····	271
法诫篇·····	274
刘义庆《世说新语》(节选)·····	277
德行第一·····	278
雅量第六·····	282
赏誉第八·····	286
颜之推《颜氏家训》(节选)·····	292
风操第六·····	293
涉务第十一·····	297
刘肃《大唐新语》(节选)·····	299
识量第十四·····	300
容恕第十五·····	303
知微第十六·····	304
顾炎武《日知录》(节选)·····	308
周末风俗·····	308
两汉风俗·····	309

#### 4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典文选

宋世风俗·····	310
清议·····	313
名教·····	314
流品·····	316
重厚·····	317
耿介·····	318
乡原·····	318
大臣·····	318
贵廉·····	319
禁锢奸臣子孙·····	320
家事·····	321
南北风化之失·····	322
后记·····	323

## 导 论

本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等论述政治文化的文章选编。政治文化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中一个常用的术语，但是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众多不同的理解。在中文学术语境中，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思想，不是简单的政治加上文化，也不止是政治领域的文化。取其宽泛的语义来说，政治文化应是区分于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的有关政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策略方针等。本书根据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基本特征，分为君道与政体、国策与方略、选官与用人、政论与史鉴、士风与世风等五个方面，将具有重要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的相关文章进行选编。每篇选文之前，都以“解题”的形式对作者及选文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评价，并概述其中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所用“中国古代”的概念，相当于西文的“前近代”，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时期。不过，本书选编的内容没有包括先秦时期的论述，选文的作者是汉代至清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即在选文涉及的时段上侧重于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如果从思想史的层面来说，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各种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论说，例如《礼记·礼运》篇中对“大同”和“小康”的论述，诸子学说中的君权理论和民本思想等，自然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内容。本书选文的原则是强调实践性和现实针对性，注重在治国实践中产生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理论，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针对现实的奏议、政论和史论，当然也都充分吸取了先秦时期的思想理论。所以说，本书所选文章侧重的是实践中的政治文化。

以下结合选文的历史和思想背景，对每个单元的选文思路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重要概念进行简要论述。

## 一、君道与政体

君道与政体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概念。这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以皇权理论为基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准则。为了保证君权的有效行使，达到良好的治理局面，一方面是君主要懂得为君之道，另一方面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此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留下了丰富的政治文化遗产。本单元选文8篇，包括刘向《说苑·君道》，荀悦《申鉴·政体》，吴兢《贞观政要·君道》、《贞观政要·政体》、《谏十铨试人表》，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柳宗元《封建论》，黄宗羲《原君》，其中《贞观政要》的两篇为节选。

### 1. “君道”与“政体”释义

刘向《说苑·君道》和荀悦《申鉴·政体》，是汉代政治文化的代表作。汉代政论家和思想家关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的治国之道的集中阐述，对后世治国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话语系统。要理解中国古代的一些重要政治理念，《说苑·君道》是一篇必读的基本文献。文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如王道帝道、明君暗君、天道祥瑞、君民、君臣、公私等政治文化范畴，以及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兼听纳谏、赏功罚过、存亡继绝等行事准则。也借用古代的典故，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如关于“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的君子之语。尽管这些认识大都还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没有完全落实到治国实践和制度设计之中，但这些概念毕竟奠定了汉代以后指导治国实践的理论基础。

《申鉴·政体》从对人性和世风的分析入手，在理论上对治国之道进行了探讨。文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治国原则或为政准则，对汉代以后

的政治文化影响至深。文中提出的许多命题，都是结合当时的政治实际，对先秦时期政治理论进行的阐释和发挥，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思想深度。文中对“政体”的解释是：“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贤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业惟敦，是谓政体也。”这种对于“王政”内容的概括，具有明显的早期帝国特征，表现为国家政务还没有分化到隋唐以后以吏、户、礼、兵、刑、工尚书六部统领全国政务的程度，而是笼统地分为“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六个还停留在概念上的范畴；同时也体现了汉儒“宗经述圣”的政治取向。

《申鉴·政体》提出的大都是总结性的原则问题，如关于“致治之术”中的“四患”、“五政”、“六则”，关于任贤能的“十难”，关于国家治理状况的“九风”等。试举“九风”的论说，以明《申鉴·政体》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其文曰：

惟察九风，以定国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乱，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亲而有礼，百僚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无事惟职是司，此治国之风也。礼俗不一，位职不重，小臣谗嫉，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君好让，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以侈为博，以佞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劬，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以苛为密，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蒙，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不谏，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故上必察乎国风也。

这里提出了国家治理状况的九种形态，是对治乱兴衰历史演进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提炼，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后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术语。

## 2. “帝道”与“王道”

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由于史官和史学在中国早期思想史上

的特殊地位，使得对王朝更迭和治乱兴衰历史现象的探讨，构成了对治国理论进行探讨的核心内容。

早期儒家政治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对古史及其政治形态进行系统性的构造。从东周到秦汉之间，以儒家为主，根据不同的古史信息，从不同渠道汇合而成了一个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圣圣相传的圣统史观，加上夏商周的历史衔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史体系。它既是一个历史演进的系统，也是一个政治观念的系统。政治观念依托于对历史时代的定位，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重要特色。

在这个系统中，尧舜之道是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之道，是帝道，其具体内容，用出土的由战国儒家编撰的《唐虞之道》的话说，就是“禅而不传”和“爱亲尊贤”<sup>①</sup>；夏商周三代之治，则是礼乐文明，是王道。《礼记·曲礼上》：“大上贵德，其次务施报。”郑玄注曰：“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报。三王之世，礼始兴焉。”大上，就是太上，谓三皇五帝之世。三王之世，就是禹、汤、文武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礼记·礼运》篇对此有更具体的解释：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唐代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二时指出：“《礼运》曰大道之行，天

<sup>①</sup>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下为公，即帝也。大道既隐，各亲其亲，即王也。”宋代朱熹在《答吕伯恭》中也谈到：“《礼运》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为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有来历，而传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二帝三王为有二道，此则有病耳。”<sup>①</sup>在朱熹看来，尧舜之道和三王之道其实是一个道，这是一个哲学意义的“道”。但从政治形态来说，其间大同与小康、帝道与王道的区别还是明显存在的。

### 3. “治世”、“盛世”与“乱世”

帝道、王道之下，在治国实践中，所达到的局面又有不同的形态。其中最判然分明的一个区分就是治世与乱世。战国秦汉之间，诸子对治世和乱世的区分以及成因进行了集中的探讨。如《荀子·大略》从义利关系上立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礼记·乐记》和《诗大序》则从乐与政的关系立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吕氏春秋·观世》在解释“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的原因时，提出圣人（欲治之君）与士（与治之臣）都少出，即使偶尔出现了也难以相遇的观点。董仲舒则从天道和人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了阐释，提出：“天出此物（春夏秋冬）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与春夏秋冬相对应的好恶喜怒）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义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sup>②</sup>又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sup>③</sup>

① 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四部丛刊本。

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四部丛刊本。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四部丛刊本。